

女性文化:消解现代性危机的女性主义进路

——齐美尔社会性别思想发微

胡美娟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齐美尔是古典社会学思想家中最为敏感锐利的性别论者之一。齐美尔的社会性别思想以形而上学为基础,对男女性别差异从本质性和文化性两个方面进行解释;将性别问题视为现代性危机之一,并剖析了两个典型女性悲惨的例证——金钱婚姻与卖淫;作为“差异的欣赏者”,齐美尔认为女性运动不应追求与男性的差异夷平,而应建立一种不同于男性文化的“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的库存中增加女性的精神价值,最终实现整个人类的灵魂平等与自由。

[关键词] 齐美尔;现代性危机;社会性别;女性文化

[中图分类号] C91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6-0059-06

Female Culture as the Feminism Approach to Settling Modernity Crises

——On the Delicate Meaning of Georg Simmel's Gender Theory

HU Meijuan

(Center for Stud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Georg Simmel, a classical sociologist from Germany, contributed his special and in-depth theory on gender. On the base of metaphysics, George Simmel discussed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perspectives of essence and culture; thought of gender issue as one of modernity crises, and analyzed two typical tragic examples of women: money marriage and prostitution; as “a thinker of differences”, he argued that the goal of women’s movement should achieve the equality and freedom of human soul through building the “female culture” and increasing women’s spiritual value, but not to eve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omen and men.

Key words: Georg Simmel; modernity crises; gender; female culture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又译西美尔或西梅尔,德国古典社会学思想家、哲学家。齐美尔的学术思想庞杂,生前发表了200多篇论文,撰写20部左右著作,主要有《论社会分化》《历史哲学问题》《货币哲学》以及《社会学》等。齐美尔的唯名论、形式主义、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思想和理解社会学思想,直接影响到以后的德国社会学家,同时对美国社会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齐美尔思想具有显著的“现代性”甚至“后现代”特征。不同于当时马克思、韦伯、滕尼斯以及杜尔干等人的宏观理论研究,齐美尔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与形式,在微观的基础上批判地分析现代文化的冲突,提出了“文化悲剧”理论。他认为现代社会传统的消失、工业生产与科技的发达,使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日益分离,以致酿成了种种现代性危机,而女性问题就是现代社会文化的危机之一。因此,他提出建立“女性文化”,作为消解现代

收稿日期:2013-06-23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13LZUJBWYJ004)

作者简介:胡美娟(1977-),女,陕西扶风人,兰州大学201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政策、穆斯林妇女研究。

性危机的进路之一。

一 社会性别的起源和差异

1. 齐美尔时代的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社会性别“gender”一词起源于20世纪中后期,是和生理性别“sex”相对应的概念。它的诞生为女性主义研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使人类对性别问题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齐美尔也许是古典社会学思想家中最为敏感锐利的性别论者之一,这源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个人原因:齐美尔与当时柏林的一批女性知识精英过往密切,其中包括一些女权主义运动者。其次是社会原因:19世纪末,大工业生产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妇女劳工问题,女性争取独立自由的妇女运动风起云涌。女人日益侵入了男人的活动范围,现代文化节奏也因之改变,女性问题日渐凸出,不再是家庭和社会的局部问题,而是进入到思想史,成为现代性的主要问题之一。齐美尔敏锐地察觉到了女性诉求与现代文化的这些新风向,并迅速在杂志、报纸上发表文章,参与当时公众对德国女性运动的讨论。齐美尔论述女性、性别问题、女性教育、家庭婚姻和妇女运动的文章约15篇,主要有《性别问题中的相对和绝对》《货币在性别关系中的作用》《女性文化》《卖弄风情的心理学》《现在和将来的卖淫琐谈》以及《现代文化中的金钱》等。齐美尔对性别关系问题的思考,其深度与广度涉及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语言犀利而尖锐,堪称“超前者”,但却一直受到主流学术界的排斥。直到1977年,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科瑟发表题为“被忽视了的齐美尔对女性社会学的贡献”一文,^[1]呼吁对齐美尔的女性论进行重新评价,齐美尔的性别理论才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

进入齐美尔具体的性别言论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齐美尔时代的女性主义的现状。德国的女性运动始于19世纪中叶,到90年代势头高涨。同一时期,与女性问题并列突出的是劳工问题。工人运动引出社会主义对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批判,女性问题则针对的是西方历史上的父权制和禁欲主义。当时德国女性运动内部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属性不同的阵营。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受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等平权主义观念支配,致力于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争取普选权与经济权,这些文化战争的指向是社会颠覆,类似于工人运动。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则以马克思·韦伯的

夫人玛丽安娜·韦伯为代表,受尼采和弗洛伊德学说影响较大,强调性别差异以及女性性别的独特性,态度温和保守,希望通过内部变革铲除社会疾病,提出的主张包括改革妇女服饰、女子进大学的权力以及妓女问题等。

齐美尔的社会性别思想似乎站在这两大阵营之外,他把两类女性的悲剧命运同等地归结为典型的现代性问题,认为正是现代工业生产造成了女性的悲剧,不论她们是否贫富。科技的过度繁荣,使作为主体的人对自己创造的客体文化越来越难以掌控。面对这种文化悲剧,齐美尔认为女性运动不该只关心女人的福利,而应该思考女性可以为现代人类文化的拯救做出哪些独特的贡献。所以,齐美尔说女性运动的意义高于工人运动的意义。相对于当时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齐美尔更关注女性运动的精神价值。因此,齐美尔的女性主义思想根底是形而上的气质,致力于探索男女两性内在本质的差异及其魅力。

2. 社会性别的起源——劳动分工。男女两性生理机制的差异自古已然。对于现代社会男女性别的文化差异,齐美尔认为是劳动分工所致。齐美尔的社会分工论与马克思、杜尔干的社会分工论不同,是一种文化哲学视角的分工论。

在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时代,劳动分工还不发达,女人经常直接地参与生产活动,在男性中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与威信,而且她的劳动也不是明确意义上的“家务”。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面向市场的生产和家庭经济开始对立,货币的兴起在性别之间引进了更明确的劳动分工。“家庭之内的事务落在女人身上,家庭之外的事务则由男人承担”。^[2]⁸¹这时,妻子的经济价值急剧下降,劳动分工被打上性别特征的烙印,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模式逐渐形成,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性别的差异逐渐拉大。货币经济下男女性别的社会分工,使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似乎只是在“非生产性地”管理和使用丈夫赚取的收入,妻子似乎是被丈夫“供养着”。所以,齐美尔得出结论:“男性和女性本质上的差异,至今为止一直依据的是性别之间始终未受影响的劳动分工”。^[2]¹⁵¹

文化哲学是齐美尔思考性别问题的独特视角。齐美尔将劳动分工导致的性别分化与文化理论联系在一起,指出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是女性面临的文化困境。人类的文化不是超性别的中立,现有的文化普遍具有男性特征。“历史上从未实现一

种不问男女的人类文化的美妙想法”。^{[2]142} 人类文化一开始就有性别的烙印,“男人创造了工业和艺术、科学和贸易、国家管理和宗教,因此它们不仅具有男人的特征,而且在不断重复的施行过程中特别需要男人的力量”。^{[2]142} 男性文化在文化的客观化过程中演变成一种“客观文化”,可以说人类文化的样态就是男性文化。齐美尔由此得出“客观的=男性的”这一等式,并用此来解释“男一女”这一对立关系。齐美尔将男女两性关系比喻为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主人不必总想着自己是主人,而奴隶却绝对不能忘记自己的地位。齐美尔认为这是男人的权力地位造成的结果。如果借用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著名概念,可以说现存大多数人类社会的“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是一种“雄性文化”,男人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自由发挥,女人却得时刻铭记自己的女性身份和次等地位,不能逾越。

齐美尔认为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原因,“不是因为女人的力量太弱小,而是因为她们表现力量的方式不适合迄今的文化劳动范畴”。^{[2]144} 齐美尔抛弃传统社会对女人的指责,认为性别问题的根源是男权文化。在文化的客观化过程中,男性文化演变成了客观文化,并要求男女两性都要适应和服从。而这种文化的评判标准和适应程度都是由男性设定的,这对评判女人产生了严重后果,女人总显得不合格,永远处于弱势。这样,有缺陷的东西都被贬斥为女性的,而对一个女人的最高赞誉就是“简直像男的”。

这就产生“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特征,并非自足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女性特征,而应该是以男性为取向的,令男人喜欢、为男人服务,补充男人”的。^{[2]174} 而作为一般标准的男性特征则很难总结,如果非要总结,则是与女性特征的完全相反或对立。

3. 两性关系的形而上学基础。齐美尔的性别理论与当代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相异。当代女性主义者强调社会性别后天建构性,以波伏娃的“第二性”最具代表。文化的性别特性确实是从后天的社会环境和习俗习得,这在上文已做论述。但齐美尔认为性别问题的核心在于男女两性存在的本质差异,而且这种性别身份的本质差异是先于存在的。所以,齐美尔形而上的性别论旨在探索男女灵魂的差异。

“两性差异是逻辑上对等的对立双方之间的一种关系”。^{[2]176} 男女两性的存在是一种二元对立与

统一,双方都需要自己的对立面,并依靠对方来决定自己。齐美尔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接近存在本身,即女人对自己作为女性身份存在的认识比男人更具本质性。男人是二元性的存在,而女人是统一的。“对男人而言,性别特性是一种行为;但对于女人而言,性别特性则是一种存在。”^{[2]176} 女人的性别特性具有独立性,受男女关系的制约较少,它是一种绝对,一种自为的存在。而男性的性别特性就存在于与女人的关系中。就性别差异的身体感觉而言,男人具有普遍的性冲动,且性活动只是其生命存在的部分功能。男人的身心分离,使男人的需要可以在抽象的女人身上得到满足。而性爱对于女人却是生命的整体、灵肉的统一。所以说,“女人更多地依恋具体的男人,而男人更多一般性地依恋女人”。^{[2]178} 在生活的把握上,男人总倾向于在两个对立的方面行动:一方面受纯粹感官性的东西吸引,另一方面又受到超验的清心寡欲的精神性吸引。而女人却一直呆在自我之中,超脱于感官情欲与超验精神的分离之外。旧的观点都认为只有男人才是真正的人,而齐美尔却将女人称为真正的人,名副其实的,而男人却“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在物种类型中,女人比男人陷得更深,男女的付出是不对等的。男人只交出部分,而女人则奉献全部,这导致社会对女人通奸的判决比男人通奸严厉得多。通奸的丈夫可以得到宽恕,并继续维持对妻子的忠诚;而出轨的妻子,她对于家庭的全部价值则已丧失。

在形而上的性别差异中,男女两性各具其类型悲剧。人的生命本质上是一个献身的过程。在两性关系中,女人的献身总是指向生命的具体性,她们奉献出自己全部的兴趣和精力,将自己的人格、中心和边缘都毫无保留地投进婚姻。而男性个体中本质的部分一开始就被职业所侵占,而没有完全进入婚姻关系。结果是,女人对男人的依赖远远超过男人对女人的依赖。然而,男人却更容易比女人感到无聊,这就构成男女两性的类型悲剧性。男人的悲剧性产生于有限的成就与无限的要求之间的矛盾,而女人的类型悲剧主要来源于其历史境况,或者说女性生命中外在的层面。女人存在的价值意识在于家庭和孩子。所以男人觉得女人似乎没有思想能力(歌德语)。男人经常为观念而生,“观念是男人无休止的使命,在观念的意义上,男人始终是一个孤独者”;^{[2]184} 而女人却因为琐碎和连续不断的家务,比男人更能抵御无聊。

二 性别问题与现代性危机

相比对社会性别起源及其形而上学基础的解释,齐美尔关于社会问题与现代性危机的看法则更具有超前性和原创性,他将金钱婚姻和卖淫作为现代性危机的两个典型例证。

1. 从买卖婚姻到金钱婚姻。齐美尔具有“货币哲学家”的眼光。齐美尔通过观察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个时代的婚姻形式,分析婚姻制度演化过程中妇女价值和男女地位的变化,并指出货币经济的繁荣使妇女的地位不断恶化。在远古的自足自给的经济时代,买卖婚姻虽然让女人地位悲惨至极,但是女人拥有经济价值的实质,买卖女人可以提高父母群体的价值以及男人的价值。“女人越是抵得上更多的公牛和母牛,她就越觉得自己有价值”。^{[2]78}而且“交换女人显示出某种社会团结的意义”。^{[2](76)}当时的买卖女人不以个人主义的经济方式进行,它是有规则的,牵涉整个部落或家族的利益,具有社会特征。而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男性奔波在外,女性拘禁于家庭。男人通过劳动获取女人,这便为嫁妆的出现铺设了道路。“男女劳动领域分离得越严重,嫁妆也就必然随之越广泛地形成”。^{[2]81}女人的经济价值急剧下降,其独立性在人类婚姻演变过程中也在不断丧失。

齐美尔对婚姻就是“交换女人”并达成某种“社会团结”的论述,虽然是只言片语,却显示出了敏锐的洞察力。在文化人类学中,对于婚姻的本质历来就有“血统论 VS 联合论”的争议。而法国人类学家从杜尔干、莫斯以降,特别重视“礼物的交换”对达成人类群体团结的意义;到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的时候,进一步将之扩展为“通过婚姻交换妇女”而促成社会的团结与联合的论断。^[3]虽然尚无证据证明齐美尔思想对法国人类学家是否产生过影响,但我们也足以断言齐美尔见解的超前性和独特性。

人类社会从自然经济转向货币经济之后,交换婚姻转变为金钱婚姻。这对女人的压制更为深重,因为与金钱的冷酷客观性相比,用于交换的礼物中起码蕴涵着更人性化的东西。婚姻的根本是经济动机,自古以来如此,现代社会甚至更甚,而现代人却有庄重的义务来羞答答地掩饰这种经济动机。金钱婚姻的特性通过征婚广告显露无余。繁荣发展的征婚广告中,征婚者或应征者的财产状况构成真正的兴趣焦点,当代社会这种案例层出不穷,如

“女大学生网上求包养”,“十个男富豪征婚、四千女子争做阔太”等新闻比比皆是。比起脉脉含情的礼物流动,现代社会赤裸裸的爱情买卖更让人感觉悲观。所以,齐美尔说:“金钱婚姻似乎是一种慢性的卖淫行为。”^{[2]89}男女献身的差异,导致女人的悲剧。女人对家庭的献身毫无保留,而男人只是部分地投入婚姻。所以,没有爱情为钱结婚,对女人来说更充满危险。

齐美尔在金钱上闻到了现代性的气味,这实际上就是现代性之“世俗化”(secularization)和“祛神圣化”(desacralization)过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金钱左右着现代人的幸福感,“大多数的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所有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10}但人们在充分享受金钱带来的自由时,却摆脱不了被金钱奴役的束缚。“金钱成为我们时代的上帝!”^{[2]13}它取代了传统礼俗社会的道德与宗教。对美好爱情、神圣价值的追求被“低俗的”金钱所消融。同时,金钱作为千差万别的东西和品质的共同价值尺度,几乎夷平了一切差异,使得人们对事物与众不同和别具一格的魅力的细腻感受越来越少。现代生活常见的是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但在个人灵魂的最深处,却是对生命本身的无聊和失望,这种致命的生命感觉的萎缩,无疑是更为根本的现代性痼疾。

2. 他者的悲惨:卖淫与道德梅毒。齐美尔将卖淫与性的经济性亦作为一种现代性危机进行解读。《现在和将来的卖淫琐谈》一文针对的现实是1841年柏林开始的卖淫管制。法律对下等卖淫与文雅卖淫区别对待:漂亮文雅的卖淫者在珠宝首饰之间选择,可怜下等的卖淫者则遭受恶心的疾病、困苦、饥饿乃至警察的威胁,而社会对前者比对后者宽容得多。如果某个街头娼妓能提高身价被富翁包养,则不仅可以减弱社会对她的憎恶,还可获得一份社会“殊荣”。

卖淫现象有古老的历史。在古老文明中,卖淫是一种习俗,而现代卖淫是社会病理的征兆。希罗多德的《历史》讲述了巴比伦人的一个规定:该国妇女必须到阿芙洛蒂神庙去卖淫一次,所得全部归神庙所有。据说,卖淫是有些古代部落女孩子的社会义务,只有通过结婚才能摆脱这种义务,人们不觉得这是什么伤风败俗的事。其实,这种古代制度是与某种神圣观念相联的,与其说是“卖淫”不如说

是“献祭”。现代社会,当女人的性一旦成为商品,用去神圣化以后的唯一价值尺度——货币——进行交换时,则其个体价值丧失殆尽,女人的地位与尊严也就遭受更为严重的侮辱。

齐美尔指出,卖淫是“他者的悲惨”,不是女人的自由选择,而是屈从于社会的要求,个人行为只不过是社会整体关系的个体符号而已。“当一个人做出决定的同时,他已经被社会所决定;当他准备采取行动时,他只是按照社会的要求在行动”。^[4]齐美尔评价卖淫是从一般的社会和文化状况的相互关系出发。如果孤立地观察卖淫,而不追究其根源或社会文化基础,做出的判决只能是简单的或不公正的。

“卖淫是性成熟的要求同结婚最低年龄的要求相冲突的结果,其悲剧不能取消,只能有所减弱,因为人们不再将这种悲剧的牺牲品看作个人过错的主体,而是看作社会过错的客体”。^{[2] 137}齐美尔认为现代卖淫是禁欲与婚前生理满足冲突的结果。客观化的婚姻形式不取消,这一矛盾不会消除。社会要求男人结婚的条件是精神、经济和性格的成熟,而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使男人在这些方面成熟得越来越晚,而性冲动的年龄却没有相应推迟,于是社会牺牲一部分女人,使未婚男人能过上正常的性生活。“巨大的社会需求会为自己找到充任这种功能的人,不惜一切代价”,^{[2] 136}“卖淫指定某些人专事此事,以防止所有其他人介入。”^{[2] 135}如果人们既不想压抑婚前欲望,又不想让女孩子供婚前的欲望使用,那么卖淫机构是必要的。而“好”社会却不愿公开承认卖淫的必要性。屈服于这种社会要求的女孩子则付出了代价,她们因男人犯下的罪恶而受惩罚。现代社会将卖淫女作为替罪羊,以宽解自己的内疚。齐美尔对这种虚伪的“好”社会深恶痛绝。他提出要提高卖淫女的地位,认为有卖淫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人道的社会。

现代社会卖淫现象的背后是金钱对个人价值的颠覆。金钱与卖淫的勾结,是现代社会道德败坏的罪魁祸首。“现代的卖淫中商品和价格之间的不成比例,不仅意味着卖身人的道德败坏,也意味着从中获利人的道德败坏”;“这是道德梅毒,它就像身体上的梅毒一样跟在卖淫之后,最终会感染没有直接卷入其中的人”。^{[2] 132}卖淫是次要的弊病,但卖淫所产生的道德败坏、思想品质普遍恶劣以及妓女犯罪,却是最严重的弊病,而古老社会的卖淫则没有。这是货币经济的现代性危机之一,男女的性关

系如果以越来越无个性的货币作为中介,女人在完全的付出中人格与尊严被彻底贬低,而男人虽然逃脱了“好”社会的谴责,却躲不开“道德梅毒”的侵蚀。

三 解决现代性危机的进路之一:建立女性文化

“齐美尔是古典社会学家中唯一一个把现代文化的发展和男人的支配相关联,并诉诸于女性和‘女性文化’解决现代性问题的人”。^[5]齐美尔“女性文化”的提出,首先是对人类文化性别特征的分析。人类文化不是超越性别的客观中立,而是由男性创造并维持的,具有男性特征的文化。“客观=男性”,女人在这种历史范式中一直处于劣势。基于这一发现,齐美尔设想“是否能够从女性本质中同样有机地产生一种文化活动,就像至今为止的文化活动一直从男性的本质中产生一样”。^{[2] 151}可以说,这是一种颇具创见性的观点,可以对反思男权社会以及调整女性主义者的论点有所裨益。

齐美尔提出的“女性文化”,也是对女权运动终极意义的探索性思考。当时德国女权运动的目标是追求女性教育、经济、就业等独立权,提倡女人进入男人领域,与他们竞争。齐美尔认为这只是妇女运动的一个粗浅阶段,没有带来人类文明任何质的进展。这种诉求只是一种重复,只是在仿制旧的男性文化价值,而没有创造新的具有女性特质的文化内容。在齐美尔眼里,女性运动追求的应该是超个人的和超社会的文化价值,旨在创造积累女性乃至人类整体的精神价值。

齐美尔“女性文化”的理论基础是性别差异。性别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忽视或回避性别差异的妇女解放运动,只会让女性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向女人开放所有的男性职业,就给女人硬套上了分化的图式,在这个图式中,女人最深邃的本质力量根本无法表达,从而夺走了女人身上的文化劳动的创造性。”^{[2] 144}20世纪50年代中国推行的妇女运动,曾以其强烈的“去性别化”色彩,打破职业的性别隔离,为妇女争取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机会,但最终却酿造了妇女的悲剧境遇——妇女身体和健康的永久性损伤。美国女性史学家贺萧与大陆学者高小贤^[6],金一虹^[7]等人在此领域的合作与研究成果表明,抹平性别差异的妇女解放神话的背后,是女性高昂的健康代价和对子女亏欠的难以弥补。而齐美尔在女权运动的早期就表达出对“夷平差

异”的反对态度。

如何创建“女性文化”?齐美尔认为首先需要职业重新分工,即对一个职业的所有劳动重新分工。“重新分工或细致区分不是指,让女人像男人那样成为自然科学家、技术员、医生或艺术家,而是指,女人能够做出一些男人做不到的事情”。^{[2]144}齐美尔是指将职业中最适合女性劳动方式的部分分化出来,形成新的劳动分工,创造一个文化的新天地。这样既可以丰富现有的职业领域,还可以转移资源空耗的男女竞争。其次,齐美尔认为建立“女性文化”的另一个面向是“女性品质”。男女形而上学本质差异显示出,女性品质其实更富有灵魂的财富,比男性品质好,因而文化的领导权就应该交给女性品质,由最好的来支配。那么,哪些领域可以让“女性品质”来做主导呢?齐美尔有以下设想:

医学领域最可能首先实现女性品质的主导价值。因为女医生对女病人的病情和需求可能有更直觉、更切肤、更细致的了解,而男医生在此领域无法企及。所以医学首先是一个女性可以开辟的大有作为的领地,在此领地,女性可以贡献其成果与精神价值。

而在艺术领域中,文学领域则可能最容易得到改变。齐美尔将历史中的男女关系类比为奴隶关系,而在文学领域中,已有女性摆脱“奴隶”地位,像一个男人一样写作,她们使用男性笔名,使人们分辨不来她们的性别。她们确实获得了成功,但这是男人形式的成功,她们从未觉察到作为女人的真正创造性和特别重要的事情。她们激烈地与男性抗争,但却把自己变成对方,成为和男人一样的人。在强行侵入男人的领域时,女人不得不屈从于男性的“形式”,而迷失了真实的自己。这种女性本质与男性形式的奇怪组合形成一种别扭的风格。为了满足男性式的客观化要求,女性独具的情感张力没有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留下女性体验言说意犹未尽的缺憾。女人外显的强势之下,隐藏的是自我的缺失。这让女人陷入了想与男性抗争、却又不得不依赖男性的悖论。^[8]要打破这一悖论,女性需要的是找回女性性别身份的认同,正视性别差异,建立性别自信。女性完全能够最自由、最独特地表现自己,在这个领域贡献女性特有的精神价值。其实,齐美尔的这一设想在今天的文学领域已有部分的实现,女作家在“私语化写作”等领域已经获得了成功。

家务劳动也是不得不讨论的一个领域。家务曾经是一种具有极高文化意义的职业,女性的天性与能力已成就了这一女性文化。但是现代货币经济使家庭生产受到限制,使得女人的家务劳动只具有日常意义,例如女人花一个上午烹煮的东西,半个小时就被吃光了。所以说女人的家务没有留下实质性“客体化”的结果,其劳动价值遭到了贬损。由劳动分工产生的男女本质上的差异,一直为大众所接受,只有女权运动之后,女人开始侵入男人的领域,才使得对女人本质区别的思考成为问题:能否产生一种女性文化,类似于男性那样?

所以,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中,女人不应该用自己的弱项与男人的强项竞争,而应该在男性的薄弱领域寻求突破,扬长避短地发挥女性潜质,占据优势地位,然后争取专属女性的特有空间、领地与话语权。这种精神领域的制高点,齐美尔称之为“一片文化的新天地”。在齐美尔看来,女性的发展,在于依靠自身优势与已有资源,寻找突围;因此,女性运动的意义不亚于当年的工人运动。人的潜质只有得到最大、最优化的开发、挖掘与发挥,不论在哪个领域,都可充分饱满地实现个体自身的价值,赢得社会尊重,建立自信,获取个体自在的心灵解脱与自由,这或许才是两性平等的终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北川东子. 齐美尔——生存形式[M]. 赵玉婷,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76.
- [2] 齐美尔.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 刘小枫,顾仁明,编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3] 埃尔曼·R·瑟维斯. 人类学百年争论(1860-1960)[M]. 贺志雄,等,译.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119.
- [4] 刘易斯·科瑟. 社会学思想名家[M]. 石人,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03.
- [5] 陈戎女. 齐美尔与现代性[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34.
- [6] 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J]. 社会学研究,2005(4):153-245.
- [7] 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J]. 社会学研究,2006(1):169-193.
- [8] 马梅萍. 论陈玉霞小说创作的女性主义特色[J]. 民族文学研究,2005(4):107-111.

责任编辑:骆晓会